臺大中文學報　第三十三期
2010年12月　頁225～266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漫遊與漂泊

——杜甫行旅詩的兩種類型

廖　美　玉*

提　　要

嚴羽《滄浪詩話》指出：「唐人好詩，多在征戍、遷謫、行旅、離別之作，往往能感動激發人意。」而離鄉背井多少都帶有對現實社會的逸離，也必然面對語言隔閡、異鄉習俗、陌生事物等衝擊與反思。杜甫一生行跡，由兩京以至吳越、齊魯、梁宋、秦隴、兩川與兩湖，高適即稱杜甫爲「東西南北人」。本文由「布衣之士」的角度切入，選擇杜甫青壯時期的漫遊，與垂暮之年的漂泊，觀察杜甫一再選擇放棄相對穩定的仕或農的謀生方式，在不斷移動並面對各式異鄉殊俗中，更深入地捕捉對生命與生活的感受力。文中分別探討杜甫如何以「漫遊」緩解「入彀」的政治拘限，並藉由「漫遊」形塑生命版圖與城市印記；又如何在「漂泊」中書寫昔賢遺跡與窮山惡水，並且在凝視歷史碎片與化外邊陲的幽居寺僧、亙古民居中，以更爲寬廣遼闊的視野，更清楚認識並且堅持自己的理念，努力在現實成就以外尋找可以獲得適當定位的座標，進而發掘隱藏於主流文明之外的人性與文化。

關鍵詞：杜甫、行旅詩、漫遊、漂泊、化外邊陲

本文於99.06.10收稿，99.11.12審查通過。

＊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Wander and Exile: Two Types of Du Fu's Traveling Poems

Liao Mei-yu*

Abstract

In *Cang Lang Shi Hua* (滄浪詩話), Yan Yu pointed out that wars, relegations, travels and separations were the most adorable topics of poems for people in the Tang Dynasty. A man outside his hometown not only lost his social connections but also faced various problems such as new languages, different customs and unfamiliar things. Du Fu visited almost all over China during his life in many kinds of forms so that Gao Shi claimed him as a "man of everywhere."

By observing his travels before his old age and his exile life in his old age, this article reveals the meaning of Du Fu's move and the way he faced cultural differences. These new adventures expanded his horizons and made him more sensible, which explains why he repeatedly quitted steady jobs like being a farmer or an officer. Even in exile, Du Fu depicted the relics of the past, dangerous landscapes, monks and ancient houses, and insisted on his life goal when continuously revising it. Du Fu made efforts to find out his best position outside the society, and successfully exhibited in his works the people beyond the mainstream and their cultures.

Keywords: Du Fu, Traveling poetry, Wander, Exile, Secluded country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Feng Chia Universit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漫遊與漂泊

——杜甫行旅詩的兩種類型

廖　美　玉

一、前　　言

唐前詩歌的描寫，旅行主要原因不外乎求學、求仕、遊宦、經商、療養、休沐等，多非主動性，長途旅行更是辛苦且充滿未知數，加上「懷鄉戀闕」的主觀性因素，使得詩中恆常傾訴著離別之苦與重逢的不可預期性，連帶著對旅行所必然面對的語言隔閡、異鄉習俗、陌生事物等接觸與反應，極多是處在封閉性狀態，也就難以擴大與外界的接觸。

蕭統《文選》將詩分爲二十三類，遊覽、行旅分爲二類，其中行旅類多爲宦遊之作。[1] 王文進全面分析了《文選》中的遊覽、行旅兩類作品，得出「『行旅』之作的『山水』多了些仕宦生涯的奔動；而『遊覽』之作的『山水』則多了份寧靜與玄遠」。[2] 有關唐代行旅詩研究，多聚焦在與仕宦有關的宦遊、貶官、遊幕等主題上。[3] 李德輝〈唐代交通與文學生產〉一文指出「唐人

---

[1] 梁・蕭統撰，唐・李善注：《昭明文選》（臺北：文化圖書公司，1969 年 11 月），卷 26-27 ，頁 362-375 。

[2] 王文進：〈南朝「山水詩」中「遊覽」與「行旅」的區分——以《文選》爲主的觀察〉，《東華人文學報》第 1 期（ 1999 年 7 月），頁 103-113 。

[3] 李建崑：〈論元和時期流貶文人之行旅詩〉，《國立中興大學文史學報》第 29 期（ 1998 年 6 月），頁 27-48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行旅詩都作於水陸交通路線上」，從交通網絡的建立分析唐人行旅詩的帶狀分布，並提出「塞遊」與「宦遊」二大主題，因而得出「唐人在這些道路上創作的行旅詩，情辭分外的悲涼怨切」的觀點。[4] 學者有關「行旅詩」的探討，大抵側重在「宦遊」所帶來的追求、挫折與奔動上。惟《孟子・梁惠王上》已指出：

>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5]

仕者與耕者、商賈係指透過選擇而獲得定位，行旅則是偏向流動不居的概念。南宋嚴羽《滄浪詩話》所謂：「唐人好詩，多是征戍、遷謫、行旅、離別之作，往往能感動激發人意。」[6] 也以行旅與征戍、遷謫並列，可見文人的「行旅詩」，側重在「仕」以外的生命活動與書寫，故本文不涉及因仕而衍生的「宦遊」、「流貶」、「遷謫」之作。

有關杜甫遊歷行蹤的研究，向爲論杜者所關注，宋王安石〈杜甫畫像〉已慨歎其「青衫老更斥，餓走半九州」，[7] 劉克莊評〈秦州〉五言二十首有云：「山川城郭之異，土地風氣所宜，開卷一覽，盡在是矣」，[8] 方回〈程斗山吟稿序〉更明白指出：

> 老杜上元元年庚子，年四十八，至成都。大曆元年丙午，年五十四。至夔

---

4 李德輝：〈唐代交通與文學生產〉，《中國社會科學院報》（2009 年 4 月）。氏另著有《唐代交通與文學》（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 年 03 月），有更全面的討論，可參閱。

5 孟子撰，唐・孔穎達疏：《孟子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82 年 8 月，《十三經注疏》本），頁 23。

6 宋・嚴羽撰：《滄浪詩話・詩評》（臺北：弘道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71 年 3 月，《詩話叢刊》本），頁 636。

7 宋・王安石：《王荊公詩李氏注附沈氏勘誤補正》（臺北：鼎文書局 1979 年 9 月），卷 9，頁 44。

8 宋・劉克莊：《後村詩話》（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6 年 10 月，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本），〈新集〉卷 2，頁 848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州。山谷論老杜詩必斷自夔州以後。試取其庚子至乙巳六年之詩觀之，秦隴劍門，行旅跋涉，浣花草堂，居處嘯詠，所以然之，故如繡如畫。又取其丙午至辛亥六年詩觀之，則繡與畫之跡俱泯。赤甲、白鹽之間，以至巴峽、洞庭、湘潭，莫不頓挫悲壯，剝浮落華，今之詩人未嘗深考及此。[9]

可見杜甫長期而廣大的行跡，一再引起論杜者的注意，近人研究成果亦堪稱豐盛。[10] 在諸多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筆者注意到唐代詩人除了原有的旅行因素外，不帶有「功利目的性」的漫遊明顯增加，[11] 如孟浩然的「秦吳多歲年」、「煙花三月下揚州」，[12] 李白的「一生好入名山遊」（〈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全唐詩》，卷173，頁1773），杜甫除了青壯之年的壯遊吳越與齊趙，垂暮之年更不惜放棄較爲安定的仕／耕生活，展開至死方休的漂泊歲月，高適乃稱杜甫爲「愧爾東西南北人」（〈人日寄杜二拾遺〉，《全唐詩》，卷213，頁2218）。唐代詩人類此爲迷花、遊山或不帶功利性目的而遠赴他鄉，格外引人注意。特別是詩人在功名科考的龐大壓力下，選擇到京城以外的地方旅行，是要逃避現實？還是要追尋自我？一般而言，士人選擇去國離鄉或徒托空言，多少都帶有對現實社會的逸離，而一個人要眞正了解自己，也往往要把

9 元・方回：《桐江集》（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影印，1970 年 3 月，《元代珍本文集彙刊》本），卷 2，頁 278-279。

10 專書如宋開玉《杜詩釋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 12 月）、簡錦松《杜甫夔州詩之現地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0 年 3 月）等，詳於地理位置、山川景觀的考校。黃奕珍《杜甫自秦入蜀詩歌析評》（臺北：里仁書局，2005 年 3 月）探討杜甫入蜀紀行詩所映現的「遠遊」與「人生」間繁複的隱喻關係，可參閱。

11 陳貽焮著：《杜甫評傳》第三章〈壯遊〉特別立了一小節「盛唐漫游之風盛行」，除了說明經濟繁榮、交通食宿等因素促成私人旅行，更積極的原因則是仕途的活躍，「要交游、干謁就須旅行」，「當然也有單爲排遣仕途失意的苦悶而漫游的」（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年 7 月），頁 35-37。不論積極或消極，仍有其目的性。

12 前者見孟浩然〈：傷峴山雲表觀主〉，後者見李白：〈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引自清・聖祖御製：《全唐詩》（臺北：盤庚出版社，1979 年 2 月），卷 160，頁 1656、卷 174，頁 1785。爲避繁瑣，以下凡出自本書者，採隨文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自己放置在一個陌生的環境中，才能在與「他者」的對應中更清楚自己的存在。一個人離開京城與家園後所必須面對的問題，包括距離感所引發的陌生感，以及氣候、風俗、飲食乃至語言的不同而衍生的障礙性等，導致離鄉、出京遠遊大都帶有被動的、淪落的與哀傷的基調。而唐代詩人則開始出現具有自發性的旅遊，或無功利目的性的漫游，既身處芸芸衆生之間，卻又能以抽離的姿態旁觀世事，因而在距離感所衍生的陌生感之外，又多了一種放縱感，極力想擺脫自己曾經習以爲常的庸俗感。獲二〇〇八年度諾貝爾文學獎的勒・克萊喬(Jean-Marie Gustave Le Clézio)，足跡、筆下遍及非洲、美洲，評選諾貝爾文學獎的瑞典學院盛讚他是一位代表「新啓程的、詩意的冒險和有感官狂喜的作者，在主流文明之外和之下的人性探索者」。[13] 以此重新審視杜甫行旅詩，數量既多，寫作面向又豐富，本文乃以「漫遊」與「漂泊」爲切入點，截取杜甫青壯時期的漫遊吳越、齊趙，及其垂暮之年的漂泊東川與兩湖，期能對杜甫行旅詩有更深入的探究，進而在以京城爲主體所建構的主流文化中，探尋更崇高、更具意義的詩人安身立命之道。

二、漫遊：生命版圖與城市印記的交互映現

（一）以「漫遊」緩解「入轂」的拘限

原始人類過著散居的生活，人們最早歌頌的聖王，著重在以「茅茨土階」展現有權者的自我約束力。[14] 城市的崛起和文明的發展，則是建立在工商業發展、軍事防禦和政治權力上，充分突顯權力宰制與資源分配的作用。《莊子・

[13] 引自傅正明：〈詩意冒險家　瑞典一片掌聲〉，《聯合報》第2版（2008年10月10日）。

[14] 漢・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記司馬談引墨子說堯舜：「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臺北：鼎文書局，1986年3月），卷130，頁329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讓王》所載〈擊壤歌〉即標示著不受帝力宰制的自在自得：

> 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15]

當國家觀念形成，不論是基於統御或服務，主要在於把「人」納入政制體系中，而莊子所要凸顯的，是人可以不用「天下」而逍遙自得於天地間。成玄英疏即指出：「處於六合，順於四時，自得天地之間，逍遙塵垢之外，道在其中，故不用天下。」以自然樸素對治國家體制，確認生命可以「心意自得」的自主權。傳爲四皓所作歌同樣映現出對政治權力的疏離：

> 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何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兮，不若貧賤之肆志。[16]

京城提供了駟馬高蓋的富貴人生，而不願爲權力所制的詩人，卻寧可選擇高山深谷的貧賤自肆。唐代的長安，展現出盛世的京城地位，政治、經濟及文化活動的蓬勃發展，加上科舉首度提供給士人入仕的正規管道，熱衷仕途成了唐代士子的普遍形象，唐太宗的「天下英雄，入吾彀中」，[17]即充分展現帝王的統御思維。此外，應試者既多，杜佑《通典・選舉三》乃指出：

> 後日月寖久，選人猥多，案牘淺近，不足爲難，乃采經籍古義，假設甲乙，令其判斷。既而來者益眾，而通經正籍又不足以爲問，乃徵僻書、曲學、隱伏之義問之，惟懼人之能知也。[18]

---

15 莊子撰，晉・郭象注，唐・成玄英疏：《南華眞經注疏・讓王第 28 》（北京：中華書局， 1991 年 7 月），卷 9 ，頁 358 。

16 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漢詩》（北京：中華書局， 1998 年 5 月），卷 1 ，頁 90 。

17 五代・王定保：《唐摭言・述進士上篇》記太宗「嘗私幸端門，見新進士綴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 3 月，《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本），卷 1 ，頁 1578 。

18 唐・杜佑撰，王文錦等點校：《通典》（北京：中華書局， 2003 年 5 月），卷 15 ，頁 361-362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爲取才而設的科考，反而成了爲難士子的檻限，讀書路徑益趨偏側，功名誘人，翻檢僻書者固然大有人在，一旦踏入政治場域，權力的滋味與宰制又是另一重考驗。房玄齡等人修撰《晉書・庾峻傳》，特別引庾峻上疏所云：「設官分職，則官寡而賢衆」，[19] 尤其唐代科舉考試提供更多機會給天下士人，加上君王本身又熱衷引領文士宴集與創作活動，固然相當程度化解了晉以來士人在「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中的窒息感，卻又面臨入仕後的「兼善天下」或「入吾彀中」的拉拒。實際的狀況是：一群通過科舉考試的菁英爭奪著有限的官職，乃如薩依德在《知識分子論》中對「知識分子」的反思，當士人參與社會政經文化活動的機會增加時，爲了避免成爲各種權利結構的一員，惟有轉身離開而以「業餘者」、「圈外人」的身分，才得以「保有足夠的自由去成長、改變心意、發現新事物、重新發現一度擱在一旁的東西」。[20] 唐代士人對此已有自覺，孟郊在審視元德秀 (696-754) 的生平後，於〈弔元魯山〉中揭示「奔競立詭節，凌侮爭怪輝」的政壇現象，在官職有限、權利甚大而任免無常的「彀」中，相濡以沫者固然難求，爲求進取而展演出「奔競」與「凌侮」的戲碼，更造成個人與同僚之間的緊張關系，有識之士如何在「彀」中依然保有古璞本眞？挑戰著士子們的自我約束力。是以〈弔元魯山〉開章即指出：

> 搏鸇有餘飽，魯山常飢空。豪人飫鮮肥，魯山飯蒿蓬。食民皆霸官，食力乃堯農。君子恥新態，魯山與古終。天璞本平一，人巧生異同。魯山不自剖，全璞竟沒躬。[21]

「入彀」之後的飫鮮肥來自「搏鸇」與「食民」，元德秀選擇以「食力」與「固窮」來消解權勢名利心，保持住個人的天璞本眞。元德秀宗弟元結（719-

[19]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臺北：鼎文書局， 1983 年 7 月），卷 50 ，頁 1392 。

[20] 艾德華・薩依德 (Edward W. Said) 著，單德興譯：《知識分子論》（臺北：麥田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頁 159 。

[21] 元德秀，字紫芝，河南陸渾（嵩縣）人。曾爲魯山令，無名利心，愛山水，彈琴自娛，天下高其行，稱元魯山而不名。有〈蹇士賦〉。詳見五代・劉昫等撰：《舊唐書・文苑傳》（臺北：鼎文書局， 1985 年 3 月），卷 190 ，頁 5050-5051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772 ），有濟世志，仕宦治績良好，卻選擇以「漫遊」對治「奔競」，緩解「入彀」的時程與拘限。元結於代宗寶應元年（ 762 ）盛年辭官，以耕釣自資，放情山水，自號漫叟，有〈漫酬賈沔州〉詩云：

> 自家樊水上，性情尤荒慢。雲山與水木，似不憎吾漫。以茲忘時世，日益無畏憚。漫醉人不嗔，漫眠人不喚。漫遊無遠近，漫樂無早晏。漫中漫亦忘，名利誰能算。（節，《全唐詩》，卷241，頁2709-2710）

以漫醉、漫眠、漫遊、漫樂的適性逍遙，呼應詩序中友人賈德方「勸爾莫作官，作官不益身」的旨意。雖然元結還是又出任了道州、容州刺史，在「刑法競欲施」（〈春陵行〉）的官場上，即使獲罪戾也要深度擁抱黎民的元結，與縱情荒慢完全不受制約的元結，揮灑出極具張力的生命樂章，既迷人又感人。唐代詩人的精彩，自當由此求，杜甫在〈同元使君春陵行〉序中稱許元結爲「落落然參錯天下爲邦伯」，並以「簡知我者，不必寄元」[22]作結，亦可見心許之深。

比起元結的由仕而漫，再由漫返仕，杜甫的「漫遊」則早在入仕之前的弱冠年就已開始了。杜甫遲至天寶十四載 (755) 秋始踏入仕途，時已四十四歲，衡諸〈壯遊〉所云「忤下考功第，獨辭京尹堂」（卷16，頁1438-1447），以及〈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一再宣稱「今欲東入海，即將西去秦」、「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卷2，頁77），受困場屋、求仕無門固然是促成杜甫漫遊的重要因素，相對地，入仕前的多次漫遊，對杜甫入仕時程的影響亦不可謂不大。尤其耐人尋味的是，杜甫入仕前的幾次漫遊，當時都未留下見聞或心情寫照，反而是在晚年的回憶中，逐步浮現且日益清晰。由此來看，「漫遊」顯然是青年時期的專利，以此延緩過早「入彀」的政治拘限與名繮利鎖。特別是到了晚年所記憶的年少意氣，更集中體現在不帶功利目的性的漫遊上，以更開放的態度面對陌生的環境，因而能在故鄉／京城以外的「他鄉」有更多的反

[22] 清・仇兆鰲輯注：《杜詩詳注》（臺北：里仁書局，1980 年 7 月），卷 19，頁 1691 。爲避繁瑣，以下凡出自本書者，採隨文標示卷頁。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省與成長。而青春年少所特有的理想性與未來性，使得漫遊雖仍未能跳脫歷來士子的京城核心觀點，卻能以不斷逸離拉開個人與京城的黏著度，如此藉由漫遊而拉大的視域，使自己避免陷溺在京城定式的窠臼中，因而得以超越社會風尚所習以爲常的庸俗。

值得一提的是，杜甫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中自陳「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征伐」的官宦子弟身分，且已受命爲右衛率府兵曹參軍，卻仍自稱「杜陵有布衣」（卷4，頁264）。即使任左拾遺時，作〈獨酌成詩〉有云：「苦被微官縛，低頭媿野人」，顯然有感於「入彀」後的奔競亂象，也爲「入彀」後的官場拘限所苦，因而對「野人」的古樸本眞，有著深沈的失落感。不論是未仕前、入仕中或棄官後，杜甫一再以布衣、野客、野老自許，如〈醉時歌〉的「杜陵野客人更嗤」（卷3，頁175），〈哀江頭〉的「少陵野老吞聲哭」（卷4，頁329），〈投簡成華兩縣諸子〉的「杜陵野老骨欲折」（卷2，頁107），〈絕句漫興九首〉的「野老牆低還似家」（卷9，頁788）等，甚至以〈野老〉爲題，呈現尋常百姓的憂慮悲愉，與山林隱逸之士的高尚之風大異其趣，在傳統士人的仕／隱兩種選項之外，另外開啓了「布衣之士」的路徑。總計杜甫一生，布衣身分遠遠凌駕於官員身分之上，更有許多歲月是在行旅中渡過，除了京城求仕時期的科考、投獻、干謁與短期仕宦，以及有卜居打算的秦隴、成都兩時期，在諸多行旅詩中，最特別的有兩種類型：一是少壯主動選擇的「漫遊」，具有自我成長的意涵，探尋歷史遺跡，海天遼闊，壯觀天際，以及同遊者的意氣豪情，都有助於眼界胸襟的開拓；一是棄官後的「漂泊」，遠赴窮鄉僻壤，茫茫天涯，無邊無際，獨自承受著無聊無賴無著落的孤寂。其〈春日梓州登樓二首〉之一即寫出：「行路難如此，登樓望欲迷。身無卻少壯，跡有但羈栖。」（卷11，頁969）樂府古題〈行路難〉所形塑的坎坷人生路，杜甫以少壯至老年的行旅生涯，親身踐履出更深沈的體驗。其二云：

> 天畔登樓眼，隨春入故園。戰場今始定，移柳更能存。厭蜀交遊冷，思吳勝事繁。應須理舟楫，長嘯下荊門。（卷11，頁969-971）

如同所有的行旅書寫，都有一個「故園」的牽繫，杜甫在成都草堂的安閒居家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生活，在某種程度上消解了「思鄉」的情愫。因此，在奔走梓州之後，即使戰亂已獲得平息，杜甫顯然無意重回草堂歲月。於是，杜甫以少壯的行旅經驗，在「登樓遠望」、「遠望思歸」的傳統主題之外，添加了「厭蜀交遊冷，思吳勝事繁」的對照係數，以記憶著年少吳越壯遊的勝事，對比出眼前蜀地生活的索然，因而給了自己一個離去的理由，繼續往另一個「異鄉」探尋更多的可能。

（二）在記憶中浮現的生命版圖與京城印記

耐人尋味的是：杜甫的記憶漫遊，與閱讀元結詩作有緊密的連結性。大歷元年 (766) 杜甫客夔州，有〈同元使君舂陵行〉詩，序中推許元結〈舂陵行〉爲「比興體制，微婉頓挫之詞」，詩中以元結的「道州憂黎庶，詞氣浩縱橫」，對照出自己的「漂泊公孫城」（卷19，頁1691-1692），更藉由不斷追憶往事以闡釋、消解眼前的漂泊之感，計有〈夔府書懷四十韻〉、〈往在〉、〈八哀詩〉、〈秋興八首〉、〈諸將五首〉、〈遣懷〉、〈昔遊〉、〈壯遊〉等長篇鉅作，[23] 除了就安史之亂與個人漂泊抒發情感與議論，更大幅度追憶入仕前的多次漫遊，將個人的漫遊見聞思感與國家的盛衰起落交織成時代交響曲，其中又以〈壯遊〉最爲完整，全詩長達五六〇字，王嗣奭以爲「此詩乃公自爲傳」。[24] 詩以「往

[23] 依宋・黃鶴《黃氏集千家註杜工部詩史補遺》附錄年譜的繫年，將〈夔府書懷四十韻〉、〈往在〉、〈八哀詩〉、〈秋興八首〉、〈諸將五首〉、〈遣懷〉、〈昔遊〉、〈壯遊〉編在大曆元年，〈同元使君舂陵行〉則編在大曆二年（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39 年 12 月初版，《叢書集成》本）。惟錢謙益《杜詩錢注・注杜詩略例》已指出：「黃鶴、魯訔之徒，用以編次後先，年經月緯，若親與子美游，從而藉記其筆札者，其無可援據，穿鑿其詩之片言隻字而曲爲之說，其亦近于愚矣。」（臺北：世界書局，1956 年 11 月，頁 4）筆者所據爲四川省文史研究館編：《杜甫年譜》（臺北：學海出版社，1981 年 9 月），〈同元使君舂陵行〉與〈夔府書懷四十韻〉等詩同列大曆元年，後者又爲深秋之作，頁 93-109。

[24] 明・王嗣奭：《杜臆》（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0 年 10 月），卷之八，頁 25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昔十四五，出遊翰墨場」發端，自剖「性豪業嗜酒，嫉惡懷剛腸」、「飲酣視八極，俗物都茫茫」，大有目空一切之概，[25] 接下來即放筆寫南遊吳越之事：

> 東下姑蘇臺，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遺恨，不得窮扶桑。王謝風流遠，闔閭丘墓荒。劍池石壁仄，長洲芰荷香。嵯峨閶門北，清廟映迴塘。每趨吳太伯，撫事淚浪浪。枕戈憶句踐，渡浙想秦皇。蒸魚聞匕首，除道哂要章。越女天下白，鑑湖五月涼。剡溪蘊秀異，欲罷不能忘。（卷 16，頁 1438-1447）

杜甫南遊吳越約在開元二十年 (732) 前後，其〈進三大禮賦表〉自陳：「臣……與麋鹿同群而處，浪跡於陛下豐草長林，實自弱冠之年矣。」（卷24，頁2103）豐草長林本指相對於朝廷的隱居之地，[26] 杜甫將之劃入帝王的統御範圍，以「浪跡」的姿態履勘京城以外的國土疆域，甚至懷抱著冒險浮海窮扶桑的勇氣，意圖探尋國境邊界之所在。杜甫在空間上跨出「威加海內」的陸地思維，在時間上更納入吳越古國的歷史記憶，由此建構出更爲廣闊的存在之感。因此，杜甫洋溢著追尋的熱情，自洛陽出發，遠赴江南，去來之間，前後估計有二、三年的時間，在金陵（今南京市）古都追懷王、謝的風流，在姑蘇（今江蘇蘇州）緬懷吳、越建國的歷史。在秀異的江南水鄉自然風光中，走過芰荷回塘，走過鑑湖（今浙江紹興）、剡溪（今浙江剡縣），一路撿拾著歷史的碎片，一邊比對著閱讀的記憶，把眼前的荒蕪丘墓、廢棄劍池、嵯峨閶門與殘存清廟，與史籍記載的諸多歷史人物故事作了連結，於是，吳太伯、越勾踐、秦始皇等帝王群像紛紛浮現，而專諸弒王僚、朱買臣衣錦還鄉、王謝文采風流等士人故事，也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展演出個人的風采。這一趟吳越漫遊，對杜甫

---

[25] 清・浦起龍《讀杜心解》評曰：「此詩可續〈八哀〉，自爲列傳也。」、「第一段寫得目空一世，自少而然。」（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0 年 7 月），卷一之五，頁 126 。

[26] 魏・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云：「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逾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北京：中華書局，1991 年 10 月，清・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本），卷 47 ，頁 1321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而言，彷彿是個人的啓蒙之旅，在京城的「入轂」、「奔競」與「凌侮」的政壇戲碼之外，藉由「異地」與「古跡」的雙重激發，放任自己在「淚浪浪」的情感傾洩中，結合自己的行旅見聞與閱讀經驗，重新思考生存空間的建構，並不只限於一個朝代、一個城市，從而把史書上所記載的個別「事件」，連結成一個具有「意義」的生存架構網絡。同時也具體回應了陳子昂〈登幽州臺歌〉的「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全唐詩》，卷83，頁902），詩人的百感交集，包括生存之感、家國之感、時間之感、歷史之感乃至宇宙之感，顯然已非一朝一代所能涵攝。

當杜甫攜帶如此行囊滿滿的體悟回到長安京城時，對「入仕」應該有更清楚的訴求與更殷切的期待，乃以「歸帆拂天姥，中歲貢舊鄉」二句承上啓下，在返回京城參加進士考試的途中，順道又拜訪了景色奇崛的天姥山（今浙江新昌），而對於京城科考的重大挫敗，則只以「氣劘屈賈壘，目短曹劉牆。忤下考功第，獨辭京尹堂」四句帶過，強烈散發的自信與傲然，顯然意識到一個置身遼闊天地間的生命藍圖，已非京城的官僚觀點所得以拘限。因而隨即轉往齊趙，投入另一次長達八九年的漫遊，〈壯遊〉自述：

> 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春歌叢臺上，冬獵青丘旁。呼鷹皂櫪林，逐獸雲雪岡。射飛曾縱鞚，引臂落驚鶬。蘇侯據鞍喜（原注：監門胄曹蘇預），忽如攜葛彊。快意八九年，西歸到咸陽。（卷16，頁1438-1447）

在約莫自二十五至三十五歲的青壯有爲時期，杜甫在齊魯、梁宋與河南偃師故居之間來去。不同於吳越漫遊的追尋自然風光與歷史遺跡，杜甫的齊魯、梁宋漫遊歷時更長，所見、所聞與所思也更爲複雜。首先，在齊趙是沈浸在裘馬清狂的騎射之樂中，春歌於邯鄲的趙王叢臺（今河北邯鄲），冬獵於齊景公田獵處青丘（今山東廣饒），呼鷹逐獸，呼鶩縱鞚，加上同遊者的意氣豪情，楊倫直以「又是一幅遊俠少年圖」作形容。[27] 至於梁宋之遊，高適、李白的加入同

[27] 清・楊倫：《杜詩鏡銓》（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5年8月），卷14，頁49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遊，更是杜甫「快意八九年」的關鍵人物，在〈遣懷〉中杜甫如此記憶著：

> 昔我遊宋中，惟梁孝王都。名今陳留亞，劇則貝魏俱。邑中九萬家，高棟照通衢。舟車半天下，主客多歡娛。白刃讎不義，黃金傾有無。殺人紅塵裏，報答在斯須。憶與高李輩，論交入酒壚。兩公壯藻思，得我色敷腴。氣酣登吹臺，懷古視平蕪。芒碭雲一去，雁鶩空相呼。（節，卷16，頁1447-1450）

吳越與梁宋同樣是歷史悠久的城邦，杜甫在吳越所見爲江山勝景與歷史殘跡相互映照，而眼前的梁宋則已由歷史古都轉變成商業城市，杜甫注意到了「以武亂紀」而不能見容於政治體制的豪俠，在這個商賈雲集、貨通四海的奢華城市，獲得了極大的揮灑空間，呼鷹逐獸與報讎殺人連結成齊、趙的意氣相傾。杜甫的歷史感則在登上春秋晉國師曠學藝的吹臺（今河南開封）時，超越了眼前的快意恩讎，另有一首〈昔遊〉云：

> 昔者與高李，晚登單父臺。寒蕪際碣石，萬里風雲來。桑柘葉如雨，飛翬去徘徊。清霜大澤凍，禽獸有餘哀。（節，卷16，頁1435-1437）

單父臺（今山東菏澤）相傳是春秋宓子賤政暇鳴琴處，與李白同爲竹溪六逸的縣尉陶沔在此築有琴臺。在商賈奢華的梁宋，杜甫以不斷撿拾與音樂教化有關的記憶，展開與商賈豪俠的對話，因而能在呼鷹縱鞚的狩獵遊戲中，感受到禽獸面臨季節凋敝與人類獵殺雙重困境所發出的哀鳴。

因此，杜甫對漫遊齊、趙的更多體會，乃在人情之美，〈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一詩有云：

> 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余亦東蒙客，憐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更想幽期處，還尋北郭生。入門高興發，侍立小童清。落景聞寒杵，屯雲對古城。向來吟橘頌，誰欲討蓴羹？不願論簪笏，悠悠滄海情。（卷1，頁45-46）

相對於京城「奔競」與「凌侮」的人際關係，漫遊旅伴的相知相惜，杜甫以日攜手而夜共被的親密身體感，帶出幽人、屯雲與古城，進而以屈原〈橘頌〉的「深固難徙」，跨越仕宦者的蓴羹之思，更以「滄海情」對治京城的簪笏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人。代宗寶應元年（762）杜甫作〈寄李十二白二十韻〉，記憶起這一段兩人同遊的歲月，有云：

> 乞歸優詔許，遇我宿心親。未負幽棲志，兼全寵辱身。劇談憐野逸，嗜酒見天真。醉舞梁園夜，行歌泗水春。（節，卷8，頁662）

剛從長安放還的李白，與受挫場屋的杜甫，成了「宿心親」的同遊伴侶，以劇談、嗜酒、醉舞與行歌的酣暢盡情，展現京城寵辱以外的野逸與天眞，並記憶成生命中的春光燦爛。

如果說行旅的同遊免不了旅伴間的對話與影響，則獨遊顯然能夠提供更多的思考空間。而齊魯畢竟是儒家聖地，杜甫的齊趙之遊又有省親的用意，〈登兗州城樓〉云：

> 東郡趨庭日，南樓縱目初。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孤嶂秦碑在，荒城魯殿餘。從來多古意，臨眺獨躊躇。（卷1，頁5）

齊魯與吳越同樣是臨海地區，獨眺日出東海的壯闊景象，呼應著吳越之遊「不得窮扶桑」的憾恨，而秦始皇遣使入海尋訪仙藥的歷史記載，在眼前的秦碑孤嶂與魯殿荒城中，十足映現出由朝代興亡所建構的人類歷史，杜甫獨遊所體現的「古意」，顯然有更耐人尋味的豐盈意涵。尤其是膾炙人口的〈望嶽〉：

> 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造化鍾神秀，陰陽割昏曉。盪胸生曾雲，決眥入歸鳥。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卷1，頁3-4）

聳立齊魯海畔的泰山，一邊是令人望洋興歎的東海，一邊是黃河出海口的遼闊平野，日初日落在此展演出昏曉分明的景象，加上雲層湧現的流動變化，杜甫以漫遊的姿態，竭盡目力眺望泰山，乃能以孔子所拉高的學者視域，取代泰山封禪的政治意涵，留給士人更多的省思空間。因此，大歷二年(767)杜甫在夔州寫作的〈又上後園山腳〉，即以記憶漫遊齊魯對照出京城措施的失當：

> 昔我遊山東，憶戲東嶽陽。窮秋立日觀，矯首望八荒。朱崖著毫髮，碧海吹衣裳。蓐收困用事，玄冥蔚強梁。逝水自朝宗，鎮石各其方。平原獨憔悴，農力廢耕桑。非關風露凋，曾是戍役傷。於時國用富，足以守邊疆。朝廷任猛將，遠奪戎虜場。到今事反覆，故老淚萬行。（節，卷19，頁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661-1662）

泰山日照的明暗變化與登高遠望八荒的記憶，使杜甫的空間感延伸向遙遠的南海朱崖與東方扶桑，而西方與北方就因永不止息的爭城爭地而被記憶成征戰之地。涵納百川的大海始終激蕩著杜甫的心思與想像，相形之下，人間帝王家的京城就顯得墨守成規，無視於東、南的浩瀚天地，不斷發動西、北的戰爭來開疆拓土，不但侵奪了外族的生存空間，也導致國內百姓的凋傷。在沒有地圖的年代，[28] 因爲親身漫遊吳越與齊魯的經歷，杜甫明確地把國境劃分爲東南與西北，也更清楚國家局勢與社會問題，因而能以更長的時間寓居京城，以最大的忍耐度極力尋求入仕的機會，在〈壯遊〉詩中杜甫寫漫遊歸來的京城際遇如下：

> 許與必詞伯，賞遊實賢王。曳裾置醴地，奏賦入明光。天子廢食召，群公會軒裳。脫身無所愛，痛飲信行藏。黑貂寧免敝，斑鬢兀稱觴。杜曲晚耆舊，四郊多白楊。坐深鄉黨敬，日覺死生忙。朱門任傾奪，赤族迭罹殃。國馬竭粟豆，官雞輸稻粱。舉隅見煩費，引古惜興亡。（卷 16，頁 1438-1447）

京城自有一套運作法則，在行禮如儀的政壇活動中，每一次的參與都只停留在程序部分，天寶十三載 (754) 的〈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即寫出：「騎驢十三載，旅食京華春。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

---

[28] 五代・劉煦等撰：《舊唐書・德宗本紀》貞元 17 年有云：「辛未，宰相賈耽上〈海內華夷圖〉及〈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臺北：鼎文書局，1985 年 3 月），卷 13，頁 395。又〈賈耽傳〉詳細記載賈耽上表所云：「去興元元年，伏奉進止，令臣修撰國圖，旋即充使魏州、汴州，出鎮東洛、東郡，間以衆務，不遂專門，績用尚虧，憂愧彌切。近乃力竭衰病，思殫所聞見，叢於丹青。謹令工人畫〈海內華夷圖〉一軸，廣三丈，從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別章甫左衽，奠高山大川；縮四極於纖縞，分百郡於作繪。宇宙雖廣，舒之不盈庭；舟車所通，覽之咸在目。」（卷 138，頁 3786）。學者認爲已知最早全國地圖即爲唐賈耽（730-805）所繪製，參見余定國著，姜道章譯：《中國地圖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年 8 月），頁 13-17。故杜甫應未及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卷1，頁75）很顯然地，杜甫縱然看到了京城君臣所看不到的國土布置與天下形勢，卻連說服有權力者的機會都沒有。「脫身無所愛，痛飲信行藏」，以致於貂敝鬢斑，朝廷都已經新舊淪替了，卻依然沒有改變權臣傾奪、王朝糜費的政壇惡習。〈壯遊〉詩也就轉入書寫「河朔風塵起，岷山行幸長」的安史之亂。這種漫遊書寫與京城記憶的交互出現，在〈昔遊〉敘寫與高李同遊之後，同樣轉入「幽燕盛用武，供給亦勞哉。吳門轉粟帛，泛海陵蓬萊。肉食三十萬，獵射起黃埃。」（卷16，頁1436）的朝廷施政，呈現出吳越、齊魯在政治性思考上的資源者輸出角色，與杜甫親身踐履所體悟出的時空感顯然大異其趨。宋・黃徹評杜甫〈壯遊〉有云：

> 書史蓄胸中，而氣味入於冠裾；山川歷目前，而英靈助於文字。太史公南遊北涉，信非徒然。觀杜老〈壯遊〉……其豪氣逸韻，可以想見。……穩坐中書，何以垂不朽如此哉！[29]

黃徹雖從江山有助於創作的角度著眼，而書史氣味與山川遊涉對於士子自我成長的影響，以及豪氣逸韻與政治場域的判然而分，實是更加值得關注的議題。

杜甫最早的一次漫遊，則是遲至大曆四年 (769) 才被記憶下來，〈哭韋大夫之晉〉詩云：「悽愴郇瑕邑，差池弱冠年」（卷22，頁1992），次年又作〈奉酬寇十侍御錫見寄四韻復寄寇〉云：「往別郇瑕地，於今四十年。來簪御府筆，故泊洞庭船。詩憶傷心處，春深把臂前。南瞻按百越，黃帽侍君偏。」(卷23，頁2066）推算杜甫約在十九歲時與韋之晉、寇錫同遊郇瑕（今山西臨沂），晚年又在川湖重逢，大歷二年 (767) 作有〈奉送韋中丞之晉赴湖南〉，[30] 而遲至韋之晉亡，杜甫才有詩記憶郇瑕之遊，除了同遊者外，顯然郇瑕之遊並沒有特別值得記憶之處。

---

[29] 宋・黃徹：《䂬溪詩話》（臺北：木鐸出版社，1988 年 7 月，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本），卷 8，頁 383。

[30] 依浦起龍《讀杜心解》詩題下注引〈湖南哭韋〉詩「犀牛蜀郡憐」，考訂「韋先官川峽之間，此蓋送韋由川遷衡詩，亦是峽內作也。」（同註 25，卷三之五，頁 39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漂泊：昔賢遺跡與窮山惡水的雙軸書寫

（一）「漂泊」所開拓的創作視域

相對於京城求仕的「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卷1，頁75），安史亂起，杜甫有了雖短暫卻是位居朝列的仕宦經歷，即使因爲疏救房琯而出爲外掾，基層官員的繁鎖庶務性工作也令他不耐煩，惟就多數中年男子而言，卻至少是工作穩定、家計無虞。而杜甫終究於乾元二年 (759) 選擇棄官，展開至死方休的漂泊歲月，這樣的決定，由許多饑寒困頓乃至垂死掙扎的詩篇中，可知杜甫確實付出很高的代價。假若不是有一個更爲崇高的理念，杜甫棄官遠離京城與故鄉的舉止，應是令人費解的。晚唐孟棨《本事詩》從杜甫的詩歌成就來探究「流離隴蜀」，指出：

> 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爲「詩史」。[31]

筆者曾引薩依德所指稱的「放逐者與邊緣人」來詮釋杜甫獲得「詩史」稱號的關鍵：[32] 薩依德所指稱的「放逐者與邊緣人」，一方面「成爲永遠的流浪人，永遠離鄉背井，一直與環境衝突，對於過去難以釋懷，對於現在和未來滿懷悲苦」，另一方面又如旅行家、探險家般充滿了好奇心，「對任何事情都不視爲理所當然」，是「永遠面向中心的邊緣」，使他們在看問題時有著「雙重視野」(double perspective)，即「同時以拋在背後的事物以及此時此地的情況這兩種方式看待事情」。[33] 以此來看杜甫「流離」所造成的距離，乃能以自外

---

[31] 唐・孟棨：《本事詩・高逸第三》（臺北：木鐸出版社，1988 年 7 月，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本），頁 14-15 。

[32] 廖美玉，〈東京與兩川——王安石、黃庭堅學杜的兩種視角〉，《傳統中國研究集刊》第六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 6 月），頁 203-222 。

[33] 同註 20 ，第三章〈知識分子的流亡——放逐者與邊緣人〉，頁 85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於京城的姿態，取得知識分子毫無避忌的獨立書寫空間。

要進一步指出的，不同於年輕時候主動選擇的「漫遊」，藉由積極投入而帶有增廣見聞與自我成長的意義。「漂泊」則是在所謀不遂之後的被動離去，因而難免帶有比較多的無奈與傷感。即使是杜甫自主性選擇棄官，杜甫由隴入蜀的這一段期間，還帶著對京城故舊的依違去留等諸多掙扎，而成都草堂時期則是杜甫一生中相對安定閒逸的歲月，其間奔走於梓州、閬州乃涉入了比較多的政局，最後終究再度決定棄草堂而買舟放流，開始了名符其實的「漂泊」歲月，個中考量，可以〈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留後兼幕府諸公得柳字〉爲例略窺一二：

> 我來入蜀門，歲月亦已久。豈惟長兒童，自覺成老醜。常恐性坦率，失身爲杯酒。近辭痛飲徒，折節萬夫後。昔如縱壑魚，今如喪家狗。既無遊方戀，行止復何有。（節，卷12，頁1064-1605）

成都歲月的最大收穫是「長兒童」的家庭責任，對杜甫而言，爲了家庭生計而努力克制「嫉惡懷剛腸」的坦率個性，尤其每當記憶起漫遊時期有如魚縱大海的豪情逸氣，對眼前自己老醜有如喪家狗的形象，自然倍覺難耐。因此乃聚焦在杜甫再度決定捨棄草堂之後的漂泊東巴及兩湖之際，特別是因爲一再主動放棄穩定謀生方式，讓家人長期承擔著饑餓窮困的日子，以及不斷漂泊所必然發生與在地磨合的問題，乃至因而更頻繁記憶起的故鄉，交互牽連而形成更複雜的對話網絡，引發更難堪卻也更爲深沈的思考，是本節所要探討的議題。

杜甫使用「漂／飄泊」一詞，除了感慨親人朋友的離散之外，用在自傷處即出現在離開成都草堂之後的夔州時期，其〈雨〉詩清楚指出：「窮荒益自卑，飄泊欲誰訴」（卷19，頁1671），點出這一時期的最大特色在於深山窮谷的地理特徵，使個體生命更加顯得無依無聊無賴無著落。而杜甫就在如此窮荒展開更爲奇崛的生命究詰，如〈宿青溪驛奉懷張員外十五兄之緒〉所云：「漾舟千山內，日入泊枉渚。我生本飄飄，今復在何許？石根青楓林，猿鳥聚儔侶。月明遊子靜，畏虎不得語。」（節，卷14，頁1218-1219）以自我提問的方式，具體寫出與草木鳥獸爲伍的處境。〈同元使君舂陵行〉也有「肺枯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太甚，漂泊公孫城」（卷19，頁1693）之歎，再舉〈君不見簡蘇徯〉爲例：

> 君不見道邊廢棄池，君不見前者摧折桐。百年死樹中琴瑟，一斛舊水藏蛟龍。丈夫蓋棺事始定，君今幸未成老翁，何恨憔悴在山中。深山窮谷不可處，霹靂魍魎兼狂風。（卷18，頁1546）

詩本爲勉勵蘇徯出仕而作，杜甫以奇絕夭矯的筆法，[34]描繪充斥著廢池、折桐、霹靂、魍魎與狂風的深山窮谷，而杜甫則努力在百年死樹、一斛舊水中尋覓潛藏難得的良材與活力。由此來看〈白帝城最高樓〉：

> 城尖徑仄旌旆愁，獨立縹緲之飛樓。峽坼雲霾龍虎臥，江清日抱黿鼉遊。扶桑西枝對斷石，弱水東影隨長流。杖藜歎世者誰子？泣血迸空回白頭。（卷15，頁1276）

這是一首拗體七律，以拗折峭硬的聲調，上五下二的違常句型，突顯出白帝古都城的特立雲表，進而以超逸目力局限的方式，極力摹寫空間幅員的遼闊，以源遠流長的長江爲軸線，從極西的弱水一路奔流，經過高江到急峽的萬千江景，入海後更湧向極東的扶桑。由當年漫遊吳越的「不得窮扶桑」，到漫遊齊魯望泰山而「決眥入歸鳥」，都還著重在身體感官的極度發揮，同時也清楚感受到身體感官的局限。在經歷過更漫長行旅與更艱難的漂泊，其所開啓的心靈視域，顯然已走出先前爲自己定義的界限，因而能夠超越身體局限而展現「洞見」能力，發展出由「決眥入歸鳥」到「扶桑西枝對斷石」的摹寫。而杜甫也將自己老邁的血肉之軀推向更高絕的時空，以一幅泣血迸空的形象永遠矗立在白帝城尖上。

當杜甫又決定揮別東巴而航向另一個陌生的異鄉，寫下〈大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峽久居夔府將適江陵漂泊有詩凡四十韻〉，回首前塵，以「廷爭酬造化，樸直乞江湖」、「甲卒身雖貴，書生道固殊」四句概括由京城走向窮

---

[34] 高步瀛：《唐宋詩舉要》引吳汝綸評此詩說：「首尾橫絕，來去無端，所謂入不言兮出不辭者也。」、「此等詩直如神龍掉尾，夭矯太空，非人間所有。」（臺北：里仁書局，2006年3月），卷2，頁24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荒的必然，即使深知這一趟垂老漂泊之旅，將如結句所云「山林托疲苶，未必免崎嶇」的險惡，仍以「喜近天皇寺，先披古畫圖。（原注：此寺有晉右軍書，張僧繇畫孔子洎顏子十哲形像。）應經帝子渚，同泣舜蒼梧」（卷21，頁1866-1874）四句展現依然奔放的熱情，以親身踐履尋求更貼近古聖先哲的形跡與心志。

無可諱言的，當杜甫晚年流落荊湖，以船爲家，水波浩渺，其所引發的漂泊之感始終不曾斷絕，如〈宴王使君宅題二首〉的「吾徒自漂泊，世事各艱難」（卷22，頁1932），〈湖中送敬十使君適廣陵〉的「遭亂實漂泊，濟時曾琢磨」（卷23，頁2057），〈舟中〉的「飄泊南庭老，祗應學水仙」（卷21，頁1901），〈又呈竇使君〉的「漂泊猶杯酒，踟躕此驛亭。相看萬里外，同是一浮萍」（卷12，頁1005），〈清明二首〉的「此身飄泊苦西東，右臂偏枯半耳聾」（卷22，頁1970）等，都毫不掩飾萍蹤不定的漂泊失意。惟如大歷三年在江陵作〈水宿遣興奉呈群公〉一詩所云：

> 魯鈍乃多病，逢迎遠復迷。耳聾須畫字，髮短不勝篦。澤國雖勤雨，炎天竟淺泥。小江還積浪，弱纜且長堤。歸路非關北，行舟卻向西。暮年漂泊恨，今夕亂離啼。童稚頻書札，盤飧詎糝藜。我行何到此，物理直難齊。高枕翻星月，嚴城疊鼓鼙。風號聞虎豹，水宿伴鳧鷖。異縣驚虛往，同人惜解攜。蹉跎長泛鷁，展轉屢鳴雞。鼕鼕瑚璉器，陰陰桃李蹊。餘波期救涸，費日苦輕齎。杖策門關遠，肩輿羽翮低。自傷甘賤役，誰愍強幽棲。巨海能無釣，浮雲亦有梯。勳庸思樹立，語默可端倪。贈粟囷應指，登橋柱必題。丹心老未折，時訪武陵溪。（卷21，頁1894-1897）

不論是個人的身心狀況、南國的天然物候或眼前的旅程走向，顯然都與杜甫的預期相悖離，因而逼出「暮年漂泊恨」的懊惱，中間以「我行何到此，物理直難齊」二句綰結，卻又絮絮叨叨細數著生活上的諸多窘境，包括以船爲家的不安定感，鼓鼙聲、風聲與虎豹聲的驚險狀，伴鳧鷖而聞鳴雞的野宿環境，種種令人難堪卻又無可奈何的情狀，都比不上「餘波期救涸，費日苦輕齎」、「自傷甘賤役，誰愍強幽棲」的生計困窘與自卑自傷。值得注意的是，主動放棄成都與夔州相形穩定的食力生活模式，選擇以繼續漂泊的來砥礪自己心志的杜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甫，不但清楚體認到自己的處境，並且承擔隨之而來的困窘、屈辱與痛苦，因此才能一次又一次地從谷底翻升，[35] 開朗地想像著釣海、梯雲、樹勳、題柱等崇高志向終有實踐日，一顆赤誠的「丹心」，不但沒有因爲現實的折磨而耗損或庸俗化，反而志氣昂揚地不斷向前邁進。要了解杜甫之所以「偉大」，這是不可忽視的一環。

（二）在絕塞異域中探訪昔賢遺跡

杜甫於代宗永泰元年（765）五月寫下〈去蜀〉：「五載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關塞阻，轉作瀟湘遊」（節，卷14，頁1217），離開經營了五年的成都草堂，乘舟東下，走向更爲荒僻之地，如〈將曉〉詩所云：「垂老孤帆色，飄飄犯百蠻」（卷14，頁1236），以五十四歲的年紀，自主性置身在一個完全陌生的異文化空間，除了要有很大的勇氣，還必須面對生計、語言、食物、住屋、風俗等諸多問題，〈贈李十五丈別〉首先提出居住問題：「峽人鳥獸居，其室附層巔。下臨不測江，中有萬里船」，三峽的崇峭崖壁、湍急峽谷，可居住空間不多，居高臨下的住屋環境，既不同於北方故鄉，也與成都平原大異其趣，考驗著杜甫一家人的適應能力，而「絕域誰慰懷」（卷14，頁1344）的空間阻絕感與陌生感，更使杜甫不斷地向任何可能接觸到的朋友發出呼喚。〈返照〉一詩甚至以「死亡」的心態封閉自己：

> 楚王宮北正黃昏，白帝城西過雨痕。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衰年肺病惟高枕，絕塞愁時早閉門。不可久留豺虎亂，南方實有未招魂。（卷15，頁1336）

在此「絕塞」中所能接觸到的「人」的存在，是歷史人物所遺留的古跡，以及被雲樹所遮掩的山村，前者已成雲煙，後者缺乏交集，此外即是擁兵自重有如

[35] 杜甫每能在一片蕭瑟中奮起，可參閱方瑜：〈困境與突圍——以杜甫〈同谷七歌〉與〈秋興八首〉中的春意象爲例〉，《臺大文史哲學報》第69期（2008年11月），頁127-14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豺虎般的驕兵悍將，因此杜甫只能以「招魂」來形容有如身處「他界」的自己。最長的一首排律〈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審）李賓客（之芳）一百韻〉即作於此際，開章便云：

> 絕塞烏蠻北，孤城白帝邊。飄零仍百里，消渴已三年。雄劍鳴開匣，群書滿繫船。亂離心不展，衰謝日蕭然。（卷18，頁1699）

強調在「絕塞」、「孤城」中的孤寂感，許多藉由「異地」體驗所激發出的心得與感慨，由於缺乏訴說的對象，無法經由討論、交流而形構成更深刻的論述與影響，因而顯得鬱悶與索然。再如〈愁（原注：強戲為吳體。）〉所云：

> 江草日日喚愁生，巫峽泠泠非世情。盤渦驚浴底心性，獨樹花發自分明。十年戎馬暗南國，異域賓客老孤城。渭水秦山得見否，人今罷病虎縱橫。（卷18，頁1599）

即使是自己的選擇，一旦身處「異域」而無法融入當地，杜甫乃以拗體寫出內心的孤寂與苦悶。特別發現到個人經驗法則的不適用，即使過去也曾有過與世疏離的情況，經由漫長歲月的挫折、磨合與調適，多少已經習以為常的「世情」，卻在此時此地變成毫無意義，杜甫因而想起那個被自己主動放棄的京城故園。最後一句的「虎縱橫」，雖然可以有隱喻的意義，[36]卻也是寫實。杜甫詩中除了山林隱逸常見的草木鳥獸，更頻頻出現「虎」這一窮谷絕域的猛獸，如：

> 石根青楓林，猿鳥聚儔侶。月明遊子靜，畏虎不得語。（〈宿青溪驛奉懷張員外十五兄之緒〉，節，卷14，頁1218-1219）
>
> 人虎相半居，相傷終兩存。（〈客居〉，節，卷14，頁1253）
>
> 泥留虎鬬跡，月掛客愁村。（〈東屯月夜〉，節，卷19，頁1770）
>
> 夜半歸來衝虎過，山黑家中已眠臥。（〈夜歸〉，節，卷21，頁1844）
>
> 舟中無日不沙塵，岸上空村盡豺虎。（〈發劉郎浦〉，節，卷22，頁1939）

[36] 楊倫《杜詩鏡銓》引張璁曰：「虎縱橫，謂暴斂也。」（同註27），卷15，頁52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杜甫詩中的「虎」，雖不乏採用「暴政猛於虎」的隱喻，乃至以「豺虎」的肉食性比喻統治階層的貪暴，惟上引詩句則明顯是虎蹤出沒，杜甫藉由泥上留下來的虎鬥痕跡，以及「不得語」、夜歸的疾行等肢體語言，突顯出居處的荒僻。其〈課伐木〉有序說明：

> 我有藩籬，是缺是補，載伐篠簜，伊仗支持，則旅次小安。山有虎，知禁，若恃爪牙之利，必昏黑搤突。夔人屋壁，列樹白菊鏝爲牆，實以竹，示式遏。爲與虎近，混淪乎無良。賓客憂害馬之徒，苟活爲幸，可默息已。（節，卷19，頁1639-1640）

明白指出與虎相近的居住環境，營建家屋乃首重防虎的安全設施。詩中特別強調如此大費周章的作爲，爲的是「空荒咆熊羆，乳獸待人肉」（卷19，頁1641），人類從掠奪者成爲被掠奪者：在京城裡，人們只知道要以其他生物作爲生存所需的食物；大自然界裡，杜甫理解到人也是其他動物賴以生存的食物。作於大歷元年 (766) 冬的〈南極〉一詩，更清楚展現絕域的居住環境：

> 南極青山眾，西江白谷分。古城疏落木，荒戍密寒雲。歲月蛇常見，風颾虎忽聞。近身皆鳥道，殊俗自人群。睥睨登哀柝，蜚弧照夕曛。亂離多醉尉，愁殺李將軍。（卷18，頁1556）

杜甫所見的夔府，充滿了異質性：在地理景觀上，夔州的群山峻嶺、深谷險川，完全不同於杜甫過去的生活經驗，〈瞿唐兩崖〉一詩即寫出「羲和冬馭近，愁畏日車翻」（卷18，頁1557）的杞人之憂。生活中與「人」有關者，除了屬於歷史遺跡的白帝古城，最多的是荒戍、哀柝、蜚弧等戰爭殺伐的標誌，即使是一般人群，「鳥道」、「殊俗」的生活模式都令杜甫感到陌生。而隨處可見可聞的蛇與虎，更使杜甫感受到威脅而處於驚懼之中。仇兆鰲《杜詩詳注》引盧世榷注解此詩指出：「首二，南方山水。三四，南方風景。中四，南方人物。末四，南方時事。」強調「南方」的特性，王奭嗣甚至以「自人群，非我族也」（頁1556），都帶有中原漢族的核心觀點，事實上，杜甫在南方已生活了一段時間，與異族的相處也能相互尊重，如〈示獠奴阿段〉詩云：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山木蒼蒼落日曛，竹竿裊裊細泉分。郡人入夜爭餘瀝，豎子尋源獨不聞。病渴三更迴白首，傳聲一注濕青雲。曾驚陶侃胡奴異，怪爾常穿虎豹群。（卷15，頁1271）

對於當地原住民能與猛獸虎豹和平相處，感到十分驚奇。特別是面對高山生活的「人生留滯生理難」，原住民以竹竿接引泉水的技巧，「接筒引水喉不乾」（〈引水〉，卷15，頁1270）更是身罹消渴症的杜甫，最感到幸福的地方。因此，杜甫不斷地深入「蠻荒」，雖然有時因爲旅途中所寄望的親友異動，而有「偶然性」的因素存在，卻不能忽視杜甫在自主選擇權上的「必然性」。這種必然性可藉由杜甫的凝視歷古遺跡加以串連。

就時間而言，在浩浩陰陽移的自然時間中，「歷史」成了稍縱即逝的故實，詩人在行旅各地時，面對傾頹坍塌、崩壞腐朽的遺址殘跡，以一個「過客」的身分，檢視著眼前的歷史殘跡，努力想像著「歷史」的整體狀態，唐詩中龐大的詠史弔古書寫，乃不斷演義著朝代的興盛與沒落。以杜甫而言，相對於早年漫遊吳越、齊趙所留連的古跡，晚年漂泊東巴、兩湖，個人心情與古跡景況都有了很大的變遷，感受自然有所不同。以去蜀後順道遊忠州所作〈禹廟〉爲例：

禹廟空山裏，秋風落日斜。荒庭垂橘柚，古屋畫龍蛇。雲氣噓青壁，江聲走白沙。早知乘四載，疏鑿控三巴。（卷14，頁1225）

吳越、齊趙雖已經歷過興亡的朝代變遷，而當地的發展仍有其延續性，故歷史古跡與人群生活是混雜在一起的，在吳越的劍池清廟旁，一方面想像起古代帝王故事，另一方面也能親切地感受著荷芰香與越女白。而忠州所見的禹廟，則滿目淒涼，依郭璞〈江賦〉所載：「若乃巴東之峽，夏后疏鑿，絕岸萬丈，壁立嶜嶪，虎牙嵯豎以屹崒，荊門闕竦而盤礴。」[37] 曾經以疏鑿之功爲人類生存史寫下關鍵一頁的大禹，此時放眼但見荒庭古屋，伴隨的是一片的江聲雲氣、

37 晉・郭璞：〈江賦〉，清・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晉文》（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10月），卷120，頁132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空山落日，把歷史感擺入空間感中，蕩漾出更多的思考空間。類似的書寫模式，不斷出現在漂泊荊湖的旅途中，如〈上白帝城〉詩云：

> 城峻隨天壁，樓高望女牆。江流思夏后，風至憶襄王。老去聞悲角，人扶報夕陽。公孫初恃險，躍馬意何長。（卷15，頁1272）

在崇崖、長流與永不歇止的風中，捕捉夏禹、楚襄王與白帝公孫瓚的政權興亡故實，人類歷史與自然環境的交會，原應激發出更深刻的體會，而在眼前瀰漫的一片角聲中，透顯出人類依然只會以戰爭加速政權的更迭。如前所述，杜甫是從朝廷「奔競」與「凌侮」的戲碼中自願出局，因而漂泊到這個絕域荒塞，卻更深刻感受到掌權者沈迷在恃力爭奪中，前賢如夏禹的奮力建設固然已告失落，而縱樂的楚襄王已與雲臺夢一起隨風飄逝。因此，杜甫寫下〈詠懷古跡五首〉的連章組詩，在窮谷荒山的一片迷離中，記憶一路走過的江陵、歸州、夔州古跡，努力藉由閱讀的歷史記憶與眼前的遺址殘跡，揀選其人生平事跡之足懷者，嘗試繪製人類生存的圖卷。其一云：

> 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地間。三峽樓臺淹日月，五溪衣服共雲山。羯胡事主終無賴，詞客哀時且未還。庾信生平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卷17，頁1499-1508）

以莊子的「支離其形」指涉故園戰亂所造成的身心罷敝，而離鄉漂泊在遠離京城的絕域荒塞，地僻高險與夷服異制的陌生感，杜甫藉由時事與歷史的連結，試圖以詩歌創作爲自己的漂泊異鄉找到精神層面的社群，也爲自己的選擇漂泊建立一套論述系統。首先是同遭外夷入侵的庾信，以詩賦寫下時代喪亂與個人流離的哀歌。巧合的是，庾信入周前，即因侯景之亂而「竄身荒谷」，其荊州江陵所居傳爲宋玉故宅，如庾信賦自言：「誅茅宋玉之宅，穿逕臨江之府」，[38] 故其二云：

> 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江山故宅空文藻，雲雨荒臺豈夢思？最是楚宮俱泯滅，舟人指點到今疑。

[38] 北周・庾信：〈哀江南賦〉，同前註，《全後周文》，卷8，頁392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卷17，頁1499-1508）

據傳宋玉憫其師屈原忠而放逐乃作〈九辯〉，杜甫去屈宋已隔千秋，時代雖異，漂泊至此，蕭條亦同，彷彿就爲了一圓「竊攀屈宋宜方駕」（〈戲爲六絕句〉，卷11，頁898-902）的宿志。相較於文學書寫所留下來的指證歷歷，現實上的宋玉故宅，除了此地，還有移居夔州〈入宅〉三首之三詩所云：「宋玉歸州宅，雲通白帝城」（卷18，頁1608），已難清楚認定了。至於放逐屈原的楚襄王，以及宋玉〈高唐賦〉所極力描摹的雲夢之臺、高唐之觀，更已完全被大自然所吸納，連廢墟碎片都不可得見。現實的政治權勢，在漫長歲月中被抹得乾乾淨淨，杜甫深刻體會到：人類文明的傳衍與建構，原來是由堅持理念而失意政壇的文人所建構出來的。其三云：

群山萬壑赴荊門，生長明妃尚有村。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黃昏。
畫圖省識春風面，環珮空歸夜月魂。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
（卷17，頁1499-1508）

前半以山水奔聚的昭君村，形塑出絕世佳人的難再得，更以荊門、紫臺、朔漠的大幅度跨越國境，極寫容顏之美與漂泊之苦交織而成的亙古孤寂。後半寫杜甫留連徹夜，深情省識畫中耀人的容顏，極力捕捉異時空下的美麗、不捨與哀愁。最後兩首寫西蜀君臣，其四云：

蜀主窺吳幸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翠華想像空山裏，玉殿虛無野寺中。
古廟杉松巢水鶴，歲時伏臘走村翁。武侯祠屋長鄰近，一體君臣祭祀同。
（原注：殿今爲寺，廟在宮之東。）（卷17，頁1499-1508）

首句用「窺」字、「幸」字，蓋諸葛亮初出草廬時，即謂孫吳「可以爲援而不可圖」，[39]則征吳自是劉備失計。因此接連以三句寫劉備 (161-223) 死事，「翠華」、「玉殿」俱爲當年蜀主之物，歲易時移，距杜甫 (712-770) 此際已逾五百年，只剩空山野寺，宋・王洙《杜工部集》於此詩下有杜甫自注云：「殿今爲寺

[39] 西晉・陳壽：《三國志・蜀書・亮傳》（臺北：鼎文書局，1986年7月），卷35，頁91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廟，在宮東。」[40] 可爲佐證。故而「翠華」、「玉殿」是虛景，「空山」、「野寺」是實景，以「想像」、「虛無」加以銜接，意謂當年的翠華玉殿都成了空山野寺，再也探尋不著任何蛛絲馬跡。而政治結構上君與臣的差異，更在歲時伏臘的村翁祭祀中完全泯滅。因此，其五乃撇開劉備，專就諸葛亮立論：

> 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運移漢祚終難復，志決身殲軍務勞。（卷 17 ，頁 1499-1508 ）

在所詠諸人中，只有王昭君與諸葛亮留有圖像，前者強調昭君故事的傳世悠久，此則極力推揚諸葛亮的崇高形象。頷聯追論「三分割據」結果實乃背離了諸葛亮「興復漢室」，一統天下的謀略，而「萬古雲霄」的盛名更非諸葛亮所在意者。明明有伊尹、呂尚之才，卻只落得陳壽作傳所稱「管蕭之亞匹」（頁 931 ），則個人志尚、實際作爲與歷史評價之間，原存在著極大的落差。劉備「窺吳幸三峽」的失計，完全打亂了諸葛亮的規畫，以致於勞而少功，抱恨以終。在政治體制上，「君王」顯然主宰了國家興衰成敗與人才命運起落的關鍵。對照杜甫入蜀後吟詠極多的西蜀君臣，或單詠，或相互映帶，而顯然對諸葛亮有著更多的敬重與憐惜。《杜詩集評》即指出：

> 公詩藏議論于抑揚之間，陳世事于音律之外，自闢堂奧，獨樹旌旗，〈秋興〉、〈諸將〉與〈詠懷古跡〉而已。[41]

包括〈詠懷古跡〉在內的三組連章詩，恰好都屬於漂泊之作，杜甫在百無聊賴的孤塞絕域，乃能自闢堂奧、獨樹旌旗，發出迥絕千古的議論。

杜甫去蜀入夔再入楚，漂泊之感日益深切，於江陵親見庾信故宅，既感其平生遭際的同爲飄泊蕭瑟，乃由江陵回溯歸州、夔州等沿途所見古跡，由庾信、宋玉宅而陽臺楚宮，又由神女而昭君村，惟〈大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

---

[40] 宋・王洙：《杜工部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1971 年 2 月，影宋本），卷 15 ，頁 672 。

[41] 清・劉濬：《杜詩集評》（臺北：臺灣金藏書局， 1972 年 4 月），卷 11 ，頁 940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塘峽久居夔府將適江陵漂泊有詩凡四十韻〉則又指出：「神女峰娟妙，昭君宅有無。曲留明怨惜，夢盡失歡娛」（卷21，頁1866-1867），是昭君宅亦在有無之間，至於青塚更遠在北方的另一個塞外絕地。而劉備與諸葛亮的祠廟，杜甫憑弔過的就有奉節永安宮、夔州、成都、崇慶州等處，至如〈諸葛廟〉的「蟲蛇穿畫壁，巫覡綴蛛絲」（卷19，頁1674-1675）、〈上卿翁請修武侯廟遺像缺落時崔卿權夔州〉的「尚有西郊諸葛廟，臥龍無首對江濱」（卷20，頁1803），景況尤其令人難堪。歷史遺跡碎片的零落不可指認，有如此者。因此，杜甫探尋過諸多古跡，〈詠懷古跡〉五首乃採取以佳人志士爲主軸的書寫，其中明確提到的君王有二位，一位縱樂，一位失計，而每一位佳人志士背後的君王，更以「無形」的姿態宰制著佳人志士的命運。杜甫在書寫策略上乃以模糊的帝王群像爲背景，淡化帝王在歷史上的威嚴地位，從而映現出不同樣式的志士佳人，如何在種種現實制度與環境的拘限下，各自展演出生命的精彩與悲哀。

因此，當大歷四年 (769) 杜甫漂泊至湖南衡州，寫下與漫遊齊魯同題的〈望嶽〉，既以「漂泊的我」與「漫遊的我」相互映照，也有「同題競彩」的自我挑戰性，是以其視域、筆調與論點顯然已大異其趣，詩云：

> 南嶽配朱鳥，秩禮自百王。欻吸領地靈，鴻洞半炎方。邦家用祀典，在德非馨香。巡狩何寂寥，有虞今則亡。洎吾隘世網，行邁越瀟湘。渴日絕壁出，漾舟清光旁。祝融五峰尊，峰峰次低昂。紫蓋獨不朝，爭長讓相望。恭聞魏夫人，群仙夾翱翔。有時五峰氣，散風如飛霜。牽迫限修途，未暇杖崇岡。歸來覲命駕，沐浴休玉堂。三歎問府主，曷以贊我皇。牲璧忍衰俗，神其思降祥。（卷22，頁1983-1986）

不同於青壯之年的漫遊齊魯，對泰山滿溢著崇敬、嚮往之情，因而在〈望嶽〉詩中完全被泰山所主導，完全符合劉勰在《文心雕龍・神思》所云：

> 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我才之多少，將與風雲而並驅矣。[42]

[42] 南朝・齊・劉勰撰，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臺北：里仁書局，1984 年 5 月），頁 51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藉由雄奇的山海自然景觀，鼓盪詩人的性靈，杜甫甚至以「決眥」張揚觀山觀海的熱情，達到「與風雲並驅」而「一覽衆山小」的效果，完全不涉及泰山封禪的政治意涵。由此來看晚年漂泊兩湖的〈望嶽〉，乃從人事的角度切入，起句即是帝舜南巡所流傳的祀典，[43] 把人間體制加到自然山嶽上，政治性祀典尤其強調「人德」的重要性。弔詭的是，「巡狩何寂寥，有虞今則亡」，有德者虞舜的南巡不返，完全沒有留下任何足跡可供追尋，即使已歷經「絕域三冬暮」而作的〈奉送十七舅下邵桂〉，仍然感歎著「縹渺蒼梧帝」（卷18，頁1581-1582）而神傷不已。因此，杜甫以個人的「隘世網」感慨上無「明德惟馨」者，並以漂泊瀟湘之人所見南嶽，船行湘江中，出現了「渴日」、「漾舟」等字眼，既寫實際泛舟行邁的景況，同時也細膩體會著當年皇娥南來尋覓帝舜而無著落，望著聳拔的五大峰、連綿的七十二峰，既身在其中卻又無處尋覓的焦急而又茫然的心情。不同於泰山的一峰獨秀，杜甫更以「祝融五峰尊」、「紫蓋獨不朝」的政治話語，標舉出紫蓋峰與祝融峰的抗衡爭雄。耐人尋味的是，杜甫接寫南嶽之神魏夫人，筆意清爽和穆，映現出宗教與政治的不同視域。卻又再度以「牽迫限修途，未暇杖崇岡」轉入個人行旅敘寫，並回扣祀嶽盛典，期許主祭的山太守：在人間祭祀禮儀的形式要件之外，如何更深入思考帝舜南巡的歷史意義。黃生評此詩指出：

> 衡、華、岱皆有望嶽作，岱以小天下立意，華以問眞源立意，衡以修祀典立意，旨趣各別，而此作尤見本領。文士無其學，儒者無其才，故兩讓之。[44]

杜甫仕宦時期經華山所作〈望岳〉詩，有「諸峰羅立如兒孫」、「安得仙人九節杖，拄到玉女洗頭盆」、「稍待西風涼冷後，高尋白帝問眞源」（卷6，頁485-486）等語，與漫遊／漂泊所作〈望嶽〉大異其趣，恰可相對照。暮年漂

---

[43] 唐・孔穎達疏《尚書正義・舜典》云：「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臺北：藝文印書館，1982年8月，《十三經注疏》本），頁38。

[44] 清・黃生：《杜工部詩說》（日本京都：株式會社中文出版社，1976年6月），卷2，頁14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泊絕域的杜甫，以其所見、所聞、所思與所感再度寫下〈望嶽〉，個人際遇、江山盛景、歷史碎片、神話傳說與政治現實交互叢結，其創作視域實已非單純的儒者或文士所能望其項背。

（三）凝視化外邊陲的幽居寺僧與亙古民居

當唐皇室將道教立爲國教時，佛教轉而在京城發展出人氣鼎盛的寺廟文化，成爲文人與權貴遊宴的重要場所。耐人尋味的是，京城時期的杜甫，並未對這些名寺古剎多所著墨，[45]雖有〈同諸公登慈恩寺塔〉一詩，卻作百憂語，甚至出現「迴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君看隨陽雁，各有稻粱謀」（卷2，頁103-107）的憂危念亂之感。反而是奔走梓州與漂泊荊湖時期有比較多與寺廟有關的作品，進一步檢視全唐詩作，可以發現該寺若非杜甫獨詠，即是首詠。杜甫奔走梓州時期涉及寺廟的作品多達十餘首，惟主要是遊寺酬應之作，[46]值得注意的是〈謁文公上方〉一詩，雖仍不脫遊寺書寫，乃在「吾師雨花外，不下十年餘」的貞定自在中，重新省視自己的漂泊：

> 甫也南北人，蕪蔓少耘鋤。久遭詩酒污，何事忝簪裾。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迴向心地初。金篦刮眼膜，價重百車渠。無生有汲引，茲理儻吹噓。（節，卷11，頁949-953）

爲了避免讓自己陷入京城的權利競逐與庸俗化，杜甫主動選擇踏上異鄉的土

---

[45] 杜甫現存最早作品爲〈遊龍門奉先寺〉，四川省文史研究館編《杜甫年譜》編入開元23年(735)，以爲「杜甫遊齊趙時，道經伊闕，遊宿於奉先寺而作是詩。」（臺北：學海出版社，1981年9月），頁23。

[46] 計有〈題玄武禪師屋壁〉（卷11，頁929）、〈謁文公上方〉（卷11，頁949）、〈涪城縣香積寺官閣〉（卷12，頁986）、〈上牛頭寺〉（卷12，頁989）、〈望牛頭寺〉（卷12，頁990）、〈上兜率寺〉（卷12，頁991）、〈望兜率寺〉（卷12，頁993）、〈陪李梓州王閬州蘇遂州李果州四使君登惠義寺〉（卷12，頁994）、〈惠義寺送王少尹赴成都〉（卷12，頁1001）、〈惠義寺園送辛員外〉（卷12，頁1002）、〈陪章留後惠義寺餞嘉州崔都督赴州〉（卷12，頁1023）等詩。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地，卻猶如薩依德所稱「永遠面向中心的邊緣」，終究未能超越政治性的簪裾與文人性的詩酒，因此，佛教的「迴向心地初」，對杜甫產生某種程度的刺激。杜甫對佛教的興趣，明顯集中在東川的崇山峻嶺中，尤以去蜀入夔後的漂泊夔州，特別關注到野寺山僧的存在，很重要的原因是寺廟給漂泊旅人提供了落腳之處，如〈題忠州龍興寺所居院壁〉詩云：

> 忠州三峽內，井邑聚雲根。小市常爭米，孤城早閉門。空看過客淚，莫覓主人恩。淹泊仍愁虎，深居賴獨園。（卷14，頁1226-1227）

荒塞絕域的居民自有其生存上的困境，能夠對旅人伸出援手的就只剩下寺廟了。〈別李秘書始興寺所居〉亦云：

> 不見秘書心若失，及見秘書失心疾。安爲動主理信然，我獨覺子神充實。重聞西方止觀經，老身古寺風泠泠。妻兒待米且歸去，他日杖藜來細聽。（卷19，頁1679-1680）

在偏遠地區，寺廟扮演著慈善救濟的角色，前引杜甫〈贈李十五丈別〉即此人，詩有云：「不聞八尺軀，常受衆目憐。且爲辛苦行，蓋被生事牽」（卷14，頁1344），以生事薄而常居於寺。而佛教的「安爲動主」、「止觀」，更是深深打動了杜甫長年漂泊的旅情。〈大覺高僧蘭若（原注：和尚去冬往湖南）〉：

> 巫山不見廬山遠，松林蘭若秋風晚。一老猶鳴日暮鐘，諸僧但乞齋時飯。香爐峰色隱晴湖，種杏仙家近白榆。飛錫去年啼邑子，獻花何日許門徒？（卷20，頁1801）

唐代招提蘭若的規模小於寺，[47]即使大覺和尚已離寺轉赴彭蠡湖南的廬山，杜甫仍然依依蘭若，在寺僧的行禮如儀中，記憶著包括弘法的佛教慧遠、濟世的道教董奉等宗教聖跡，映現出由少數典範所引導的宗教意涵。惟對杜甫而言，「迴向心地初」的漂泊初衷，畢竟不同於宗教取向，其〈謁眞諦寺禪師〉云：

---

[47] 宋・宋祁、歐陽修等撰：《新唐書・食貨志》云：「武宗即位，廢浮圖法，天下毀寺四千六百、招提蘭若四萬，籍僧尼爲民二十六萬五千人，奴婢十五萬人，田數千萬頃，大秦穆護、祆二千餘人。」（臺北：鼎文書局，1985年2月），卷52，頁136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蘭若山高處，煙霞嶂幾重。凍泉依細石，晴雪落長松。問法看詩妄，觀身向酒慵。未能割妻子，卜宅近前峰。（卷20，頁1802）

座落山高嶂深的寺廟，自有著隔絕塵世的清冷超然，問法觀身固然可消解「久遭詩酒汚」的宿業，而一生執著的家國人情畢竟無法割捨。因此，杜甫與佛教終究只是擦身而過的風煙，出夔入湖後雖仍有〈留別公安大易沙門〉等作，惟其目光則已聚焦在亙古民居上。

大歷三年 (768) 春杜甫賦〈將別巫峽贈南卿兄瀼西果園四十畝〉，開章自述「苔竹素所好，萍蓬無定居。遠遊長兒子，幾地別林廬。」（卷21，頁1862）放棄可堪維生的四十畝果園而離夔出峽。杜甫不斷選擇漂泊的重要意義，在於不懈地、熱誠地探求人類生存處境與個體生命意義，並且不斷累積見聞與開拓視域。惟如〈秋日荊南述懷三十韻〉自述身世所云：「星霜玄鳥變，身世白駒催。伏枕因超忽，扁舟任往來。九鑽巴噀火，三蟄楚祠雷。」從入蜀後的「九鑽火」，以及荊楚以來的「三蟄雷」，杜甫爲漂泊所付出的代價是「素業行已矣，浮名安在哉」，即使杜甫在江陵有比較多的親友故舊社交活動，然而當生活只剩下「苦搖求食尾，常曝報恩鰓」、「飢藉家家米，愁徵處處杯」（卷21，頁1904-1909）時，這一年秋天杜甫決定繼續往前漂泊，〈舟出江陵南浦奉寄鄭少尹審〉詩有云：「更欲投何處？飄然去此都。形骸元土木，舟楫復江湖」、「溟漲鯨波動，衡陽雁影徂。南征問懸榻，東逝想乘桴」（卷22，頁1920-1921），對前途充滿了不確定性，把生命回歸到土偶、木偶的「敗則歸土」與「未知所止息」，[48] 甚至乘桴浮海的念頭都出現了。杜甫把生命如此放空後，一路更往南行，展現的是另一種不同的視野，大歷四年 (769) 春抵達長沙，其〈湘夫人祠〉發出「蒼梧恨不盡，染淚在叢筠」（卷22，頁1955）的感慨，又有〈祠南夕望〉云：

[48] 漢・司馬遷：《史記・孟嘗君列傳》：「蘇代謂（孟嘗君）曰：『今旦代從外來，見木禺人與土禺人相與語。木禺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禺人曰：『我生於土，敗則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臺北：鼎文書局，1986 年 3 月），卷 75，頁 235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百丈牽江色，孤舟泛日斜。興來猶杖屨，目斷更雲沙。山鬼迷春竹，湘娥倚暮花。湖南清絕地，萬古一長嗟。（卷22，頁1956）

從上古的虞舜南巡不歸、二妃尋訪未得，到屈原放逐作〈山鬼〉與〈湘君〉、〈湘夫人〉，而今杜甫漂泊至此，仍是一片蒼茫的原始山林，用「清絕」二字形容，徹底隔絕了塵世人煙，因而以〈上水遣懷〉自剖一路從京城漂泊到此「清絕地」的原委，更進而追思古人：

冥冥九疑葬，聖者骨已朽。蹉跎陶唐人，鞭撻日月久。中間屈賈輩，讒毀竟自取。鬱悒二悲魂，蕭條猶在否。（節，卷22，頁1957）

杜甫努力撿拾萬古中偶然到此的古聖先賢，僅得虞舜與屈賈。其中聖者虞舜的年代過於久遠而難以追蹤，屈原與賈誼則明顯是因爲忠直而取忌遭讒。篇末杜甫更以「蒼蒼衆色晚，熊掛玄蛇吼。黃羆在樹顛，正爲群虎守」的窮荒晚景，發出「羸骸將何適」的哀鳴，隱然與屈賈二悲魂同病而相召喚。值得注意的是，在此萬古中連逐客都屈指可數的清絕地，杜甫不忘以細筆刻劃上水行舟的篙工：

嵽嵲清湘石，逆行雜林藪。篙工密逞巧，氣若酣杯酒。歌謳互激越，回斡明受授。善知應觸類，各藉穎脫手。古來經濟才，何事獨罕有。（節，卷22，頁1958）

生活在這一片荒山惡水的當地住民，不但巧妙地克服了逆水行舟的困境，在辛苦勞力與驚險激流中，更藉歌謳展現出有如酣酒般的豪氣，以及前後呼應的團隊精神。杜甫由此理解到：篙工操舟的逆水回斡與鋒穎脫手，觸類以推，即是經濟長才！全詩即以「庶與達者論，吞聲混瑕垢」作結，在衮衮登臺省的諸公眼中，人微者其言輕，杜甫以篙工爲師的體悟，畢竟難登大雅之堂。百姓的智慧雖無法參與時代的改變，卻影響了杜甫的思維，在〈遣遇〉詩中一方面對「舟子廢寢食，飄風爭所操」誠摯表達「謝爾從者勞」之意，更進一步寫下：「石間采蕨女，鬻市輸官曹。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號。」（節，卷22，頁1959-1960），國家的安全與稅收是由貧苦庶民所支撐，繼天寶末年杜甫在京城所揭露的「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朱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卷4，頁269-270），歷經仕宦與棄官漂泊之後，杜甫對平凡百姓的關注始終未曾衰歇。如沈既濟（約750-800）論爵祿之失指出：

> 先王制士，所以理物也；置祿，所以代耕也。……後代之士，乃撞鐘鼓，樹臺榭，以極其歡。而農工鞭臂背，役筋力，以奉其養。得仕者如昇仙，不仕者如沈泉。歡娛憂苦，若天地之相遠也。[49]

京城的富庶繁榮與高尚品味，建立在遍布四方百工的辛勞生產，一旦賦役不至，則京城必然蕭索。享有豐沛資源的京城得仕者，恆常把這一個支撐京城繁華的廣大庶民群體，化約成不具個人特色的「治於人」的「勞力」者。不論漫遊或漂泊，都使杜甫在京城以外注視著這一群龐大的庶民百工。而杜甫詩中的諸多關注點，乃在中唐激起如沈既濟等人的反省並且形成議論。做爲先行者，杜甫除了表達對平凡百姓的關懷，還有更高一重的敬重，因而在〈嶽麓山道林二寺行〉詩中開啓了更高一重的視域，把兼具宗教性與政治性的寺廟，轉變成與民同在的桃源：「飄然斑白身奚適，傍此煙霞茅可誅。桃源人家易制度，橘洲田土仍膏腴」，進而寫出：

> 昔遭衰世皆晦跡，今幸樂國養微軀。依止老宿亦未晚，富貴功名焉足圖。久爲謝客尋幽慣，細學何（當作周）顒免與孤。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鳥山花共友于。宋公（原注：之問也）放逐曾題壁，物色分留待老夫。（節，卷22，頁1986-1989）

視域一轉，心境乃寬，原來頗難適應的異方殊俗，如今成了可以終老的「樂國」，隱然有陶淵明「覺今是而昨非」（〈歸去來兮辭〉）的體悟。再加上謝靈運的尋幽訪勝，周顒的好佛食蔬，甚至宋之問放逐嶺南途經長沙的題詩，完全取代了「鬱悒二悲魂」的屈原與賈誼。由此提出的「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鳥山花共友于」，以人爲主體所建構的生存世界，惟有對天地萬物懷抱著善意，

[49] 唐・杜佑撰，王文錦等點校：《通典》（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5月），卷15，頁44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才能在主體情性與外在環境的交感互動中，擁有桃源人家的亙古自在。終杜甫一生，感時傷逝、歎老嗟卑、憂國憂民、憂生念亂之感，始終不曾去懷，惟此浪跡荒山、漂泊江湖之際，因注視著急流上行篙工與石間採蕨女，乃能有如此化境。

四、結　　語

治人者努力意圖以完善的體制，讓國家能夠長治久安，讓百姓能夠安居樂業，制度的建立在統治與管理上有其方便性與有效性。惟如漢樂府〈東門行〉所云：「盎中無斗儲」、「桁上無懸衣」的現實處境，如何在「今時清廉，難犯教言」中獲得生路？[50] 是芸芸衆生期待的救贖。而做爲支撐統治體系的士／仕，如何在不對等的治人者／君與治於人者／庶民之間，能適切扮演關鍵的角色，特別是身處制度嚴明且已習以爲常的政壇中，如何避免鈍化自己的感受力與理想性，對士人而言自是極大考驗。

杜甫一生行跡，由兩京以至吳越、齊魯、梁宋、秦隴、兩川與兩湖，高適即稱杜甫爲「東西南北人」。本文由「布衣之士」的角度切入，選擇杜甫青壯時期的漫遊，與垂暮之年的漂泊，觀察杜甫在不只一次放棄相對穩定的仕或農的謀生方式，固然每一次都有其導因，惟整體來看，仍不難看出杜甫有意選擇一條與衆不同的道路，而細究其深沈底蘊，不甘在一成不變的體制軌範與生活常規中，鈍化自己對生命的覺知能力與對生存處境的感受力，惟有藉由一次又一次的離去，在不斷移動並面對各式異鄉殊俗中，更深入地捕捉對生命與生活的感受力，以情感上的悲喜相遭，激發出更爲豐沛而強大的創作力。

不可避免地，離鄉背井多少都帶有對現實社會的逸離，也必然面對語言隔閡、異鄉殊俗、陌生事物等衝擊與反思。因此，即使是杜甫自主性選擇漫遊與漂泊，由於去國離鄉所必然衍生的不安全感和邊緣地位，其所開啓凝視與回顧

[50] 同註 16 ，卷 9 ，頁 270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多重視域，意識到認同與意義的流動性，進而產生對政治宰制與社會規範的疏離，重新思考存在於不同地域、不同階層中的各種現象，成爲在時代氛圍中預見未來發展趨勢的觀察者，形塑出反庸俗、反制約與去疆界的想像與書寫。本文乃著重探討杜甫在「自我／他者」的相互映照中，如何藉由「漫遊」形塑生命版圖與京城印記，又如何在「漂泊」中書寫昔賢遺跡與窮山惡水，並且在凝視歷史碎片與化外邊陲的幽居寺僧、亙古民居中，以更爲寬廣遼闊的視野，更清楚認識並且堅持自己的理念，努力在現實成就以外尋找可以獲得適當定位的座標，進而發掘隱藏於主流文明之外的人性與文化。

（責任校對：胡頎）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孟子撰，唐・孔穎達疏：《孟子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82 年8 月，《十三經注疏》本。

唐・孔穎達疏：《尚書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82 年8 月，《十三經注疏》本。

莊子撰，晉・郭象注，唐・成玄英疏：《南華眞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91 年7 月。

漢・司馬遷：《史記》，臺北：鼎文書局，1986 年3 月。

南朝齊・劉勰撰，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臺北：里仁書局，1984 年5 月。

西晉・陳壽：《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臺北：鼎文書局，1986 年7 月。

梁・蕭統撰，唐・李善注：《昭明文選》，臺北：文化圖書公司，1969 年11 月。

唐・杜甫著，宋・黃鶴：《黃氏集千家註杜工部詩史補遺》，臺北：臺灣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務印書館，1939年12月初版，《叢書集成》本。
＊唐・杜甫著，明・王嗣奭《杜臆》，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0年10月。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輯注：《杜詩詳注》，臺北：里仁書局，1980年7月。
＊唐・杜甫著，清・浦起龍：《讀杜心解》，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0年7月。
＊唐・杜甫著，清・楊倫：《杜詩鏡銓》，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5年8月。
＊唐・杜甫著，清・劉濬：《杜詩集評》，臺北：臺灣金藏書局，1972年4月。
＊唐・杜甫著，清・黃生：《杜工部詩說》，京都：株式會社中文出版社，1976年6月。
唐・杜甫著，清・錢謙益注：《杜詩錢注》，臺北：世界書局，1956年11月。
唐・杜佑撰，王文錦等點校：《通典》，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5月。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臺北：鼎文書局，1976年1月。
唐・孟　棨：《本事詩》，臺北：木鐸出版社，1988年7月，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本。
五代・王定保：《唐摭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3月，《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本。
五代・劉　昫等撰：《舊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85年3月。
宋・王　洙：《杜工部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1年2月，影宋本。
宋・王安石：《王荊公詩李氏注附沈氏勘誤補正》，臺北：鼎文書局，1979年9月。
宋・宋祁、歐陽修等撰：《新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85年3月。
＊宋・黃　徹：《碧溪詩話》，臺北：木鐸出版社，1988年7月，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宋・劉克莊：《後村詩話》，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6 年10 月，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本。

＊宋・嚴　羽：《滄浪詩話・詩評》，臺北：弘道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71 年3 月，《詩話叢刊》本。

元・方　回：《桐江集》，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影印，1970 年3 月，《元代珍本文集彙刊》本。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臺北：盤庚出版社，1979 年2 月。

清・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91 年10 月。

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5 月。

高步瀛：《唐宋詩舉要》，臺北：里仁書局，2006 年3 月。

二、近人論著

方　瑜：〈困境與突圍——以杜甫〈同谷七歌〉與〈秋興八首〉中的春意象爲例〉，《臺大文史哲學報》第69 期（2008 年11 月）。

＊王文進：〈南朝「山水詩」中「遊覽」與「行旅」的區分——以《文選》爲主的觀察〉，《東華人文學報》第1 期（1999 年7 月）。

四川省文史研究館編：《杜甫年譜》，臺北：學海出版社，1981 年9 月。

宋開玉：《杜詩釋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12 月。

李建崑：〈論元和時期流貶文人之行旅詩〉，《國立中興大學文史學報》第29 期（1998 年6 月）。

李德輝：〈唐代交通與文學生產〉，《中國社會科學院報》（2009 年4 月）。

李德輝：《唐代交通與文學》，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 年3 月。

黃奕珍：《杜甫自秦入蜀詩歌析評》，臺北：里仁書局，2005 年3 月。

陳貽焮：《杜甫評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7 月。

傅正明：〈詩意冒險家　瑞典一片掌聲〉，《聯合報》第2 版（2008 年10 月10 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廖美玉：〈東京與兩川——王安石、黃庭堅學杜的兩種視角〉，《傳統中國研究集刊》第6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6月。

簡錦松：《杜甫夔州詩之現地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0年3月。

＊美・艾德華・薩依德著，單德興譯：《知識分子論》，臺北：麥田出版社，1997年11月。

＊美・余定國著，姜道章譯：《中國地圖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8月。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Huang, C. (1983). *Gong xi shi hua* (Huang Che's literary criticism of poetry). Taipei: Mu-Duo.

Huang, S. (1976). *Du gong bu shi shuo* (Huang Sheng's literary criticism on Du Fu's complete poems). Kyoto: Chinesebook.

Kangxi Emperor. (1979). *Quan tang shi (Collected Tang Poems).* Taipei: Pan Geng.

Liao, M.-Y. (2009, June). Dong Jing and Liang Chua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Wang An-Shih and Huang Ting-Jian's imitation of Du Fu. *Journal of Historical China Studies, vol. 6*, 203-222.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

Liu, J. (1972). *Du shi ji ping* (Collected literary criticisms on Du Fu's complete poems). Taipei: Jing Cang Books.

Pu, Q.-L. (1970). *Du du xin jie* (Annotations on Du Fu's complete poems). Taipei: Taiwan Chung Hwa Books.

Qiu, Z.-A. (1980). *Du shi xiang zhu* (Detailed annotations on Du Fu's complete poems). Taipei: Li-Ren.

Said, E.-W. (1997). *Zhi shi fen zi lun (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The 1993 Reith lectures).* (Shan Te-Hsing, trans.). Taipei: Rye Field.

Wang, S.-S. (1985). *Du yi* (Annotations on Du Fu's complete poem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aipei: Taiwan Chung Hwa Books.

Wang, W.-C. (1999, July).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hsing-lu and yu-lan in Southern Dynasty's landscape poetry: An observation based on *Wen Hsuan*. *Dong Hwa Journal of Humanistic Studies, vol.1*, 103-113.

Yan, Y. (1971). *Cang lang shi hua* (Yan Yu's literary criticism of poetry). Taipei: Hong Dao Wen Hua.

Yang, L. (1975). *Du shi jing quan* (Revisions and annotations of Du Fu's complete poems). Taipei: Taiwan Chung Hwa Books.

Yu, D.-G. (2006). *Zhong guo di tu xue shi (History of Chinese Cartography)*. (Jiang Tao-Zhang, trans.). Beijing: Beijing Universit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